

把握APEC合作機遇 強化香港「超級聯繫人」功能



第33屆APEC財長會將於10月20日至21日在香港舉行，下月18日至19日APEC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登場。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逆全球化抬頭，保護主義之風越颺越烈。中國主辦APEC會議的現實貢獻，在於進一步推動自由貿易，堅持開放市場規則，把會議達成的共識聲明轉化為加強區域合作的具體措施，為亞太互利合作、世界經濟穩定增長，注入更多確定性、正能量。香港的使命，則是成為促進亞太互利合作的重要平台，強化「超級聯繫人」功能。

陳柏瑾 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

保護主義雖沒讓貿易消失，卻讓貿易變得更貴、更複雜、更不確定。

世界貿易組織（WTO）於10月8日將2026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長預測上調至3.9%，商業服務貿易量增長預測下調至3.3%。全球供應網絡仍能調整、分散衝擊。但制度壓力真實存在：WTO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貿易政策活動指數顯示，2026年1月至5月政策活動強度接近2024年的兩倍，近期增量主要由限制性措施推動。2024年10月中至2025年10月中，全球各國新增的關稅及其他進口措施，覆蓋約2.64萬億美元進口貿易，約佔全球進口貿易總額的11.1%。按納入截至2026年7月底關稅措施的測算，約72%全球貨物貿易仍按最惠國關稅條件進行，低於2025年初約80%。

關稅戰提高了交易成本；貿易規則頻繁變化，抬高了長期投資的風險；重複認證、不同數據要求則增加了跨境經營成本。大型企業或可通過重組供應鏈、轉嫁合規開支，從而減輕保護主義帶來的經營壓力，但廣大中小企業則面臨難以承擔的衝擊，繼而影響到各國的就業、消費。

支持多邊貿易體制 彰顯中國擔當

在此背景下，加強APEC各經濟體的協商合作，正是應對保護主義的必要途徑。2014年APEC北京峰會達成的《北京路線圖》明確指出，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仍將是APEC的關鍵宗旨，建設亞太自貿區的前提是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並為其提供有益補充。如今，中國主辦APEC會議的意義，就在於把支持、完善多邊貿易體制落實到具體行動的層面。

今年5月，APEC貿易部長會議在中國江蘇省蘇州市舉行，會議發表的《蘇州聲明》提出了破解保護主義的亞太思路。各方重申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和亞太自貿區建設，積極響應世貿組織改革需要，兼顧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差異化訴求，堅持包容普惠、平等互利發展。針對供應鏈斷裂、規則碎片化、數字治理缺失、綠色貿易壁壘等全球性難題，明確了務實可行的區域合作方案，將為構建穩定有序的國際經貿秩序提供重要參考，持續提升亞太在全球經貿治理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7月，APEC數字和人工智能部長會議在四川成都舉行，各方達成的《成都聲明》，不僅是APEC各經濟體

共同推動務實合作的共識，也對外釋放了APEC經濟體堅定支持開放、創新、合作，共同擁抱數字和人工智能技術，攜手塑造亞太創新發展新優勢的積極信號，為全球經濟復甦注入了穩定預期和強大信心。

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貿治理體系受到嚴重挑戰的背景下，中國主辦今年的APEC會議，明確了區域經貿合作的重點方向及實施路徑，充分釋放區域經貿合作的潛力，更好發揮亞太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對沖全球經濟下行壓力，為亞太經濟持續穩定復甦提供堅實支撐，彰顯中國的擔當和貢獻。

推進亞太自貿合作 貢獻香港力量

香港自1991年起參與APEC，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相關工作。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獨特優勢難以替代，扮演好聯通國家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香港在亞太區域合作與全球多邊貿易中將發揮更大作用。

香港持續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穩居第三，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香港具備「兩文三語」和普通法優勢，金融、航運、貿易和專業服務與國際標準無縫對接。2025年，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管理資產總值達42.2萬億港元，全年淨資金流入2.1萬億港元；2025年經香港安排發行的國際綠色及可持續債券總額達377億美元，佔亞洲區40%，連續8年居首。這些數字顯示，香港有能力把跨境合作項目轉化為資本市場追捧的產品。

香港承辦APEC財長會，能夠為亞太各經濟體圍繞宏觀經濟協同、跨境投融資、風險防範等議題提供專業對話空間。此次財長會將圍繞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普惠金融發展和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四項重點議題深入討論。這些領域正是香港具有優勢、能積極作出貢獻的範疇。

例如數字基礎設施融資可視為香港推進亞太區域合作的試金石。數據中心、通信網絡和雲端設施需要長期資金，但投資的成敗取決於需求、收費、電力供應、技術更新和監管環境等諸多因素。香港不僅僅是簡單地提供資金，而是充當制度對接的接口，通過積極推進數字化貿易規則與標準的制定，利用自身獨特優勢在亞太自貿區談判與規則整合的過程中貢獻香港力量。這既是香港的使命，也是香港的機遇所在。

選委會選舉競爭激烈 盡展優質民主

鄭嫣然

香港向來都是鍾靈毓秀、臥虎藏龍的寶地，選委會選舉則乃遴選出類拔萃者之最佳良機。

本屆選委會提名期僅展開一周有餘，就已經新人湧現，各界別分組超額報名，競爭異常激烈的大好現象，實屬廣大市民之福。截至本月14日，選委會選舉再收到28份提名，新增兩個界別滿額，以及一個界別超額，在全部40個分組中，共錄得多達27個界別超額，人才濟濟一堂，各界精英薈萃於此，充分凸顯新選制的優越性與競爭性。

選委會在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中具有重要的憲制地位。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選委會委員的規模擴至1,500人，在落實「愛國者治港」、保障國家安全的前提下，中央有機結合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全力推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優質民主，令社會各界別、各階層都能在管治架構得到充分代表，並首次納入基層社團、同鄉社團及中小企業界等新界別，令制度架構更趨完備。

拿出真才實學 不負社會期望

當選委，要有真本事。各行各業的代表人物踴躍參選，希望為香港未來發展貢獻一分力。在媒體鏡頭下，各參選者滿懷信心，從容中帶着慎重，皆因深知選委所肩負的重大憲制責任與社會期望。

細看名單，不難發現既有城中德才兼備之輩，亦有執行業牛耳之翹楚，還有朝气蓬勃的後起之秀，一時之間百花齊放，令選舉展現優中選優、均衡參與的盛況。

今屆選舉競爭顯著增強，告別自動當選的「躺贏」，參選人必須接受選票的考驗。回顧上屆選委會選舉，36個需要選舉的分組界別中，有23個是自動當選。然而，今屆選舉即使一向以來競爭平穩的界別，例如鄉議局也出現競爭，錄得30人競逐27個席位，充分顯示有競爭才有進步。

專業分組最能展現「優中選優」的選舉新風。以累計錄得23人競逐15個席位的「醫學及衛生服務界」為例，報名參選的既有主理醫療政策的前任官員，亦不乏奮戰在救急扶危前線的知名醫生與護士代表。香港是金融之都，佔17席的「金融界」至今

累計20人競逐，均為具代表性的業界佼佼者，涵蓋多名銀行及金融機構傑出人士，亦有青年才俊首次參政。法律界新面孔亦不少，資深行業精英與大量具備創新思維的青年新血相輝映，展現跨世代的薪火相傳。

當選委，要有真慧眼。選委會肩負重任，不但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部分議員，也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本屆選委會選舉的後起之秀如雲，滿載革故鼎新的動能，以卓越政綱細化優質民主，力求繼往開來為香港謀求發展，大利特區前景。

用政綱推動香港由治及興

參選人都非常重視政綱，明確針對所屬界別的具體痛點提出完整的政策建議，展現專業能力與務實作風，切實做到拼政綱、拼能力、拼住績。凡此種種皆證明新選制已在香港生根發芽，成熟完備，正以良性選舉之風，確保「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全面落實。

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國際金融、經貿中心，不但擁有高度開放自由，同時法治健全、社會多元、人人平等，故此，香港民主政制定然要保障社會各界均衡參與，充分體現社會整體利益。

選委會參選人的政綱深度展現全局觀，不只代表單一界別，更促進跨界別合作，着眼於長遠的協同效應；同時實事求是，聚焦培育香港的新質生產力，涵蓋航天科技、太空法、綠色金融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新興產業配套。參選人政綱亦關注所屬業界，例如專業界與商界政綱注重主動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角色，積極強化與內地及國際對接。基層及地區分組參選人接地氣，就普羅市民關心的房屋、安老、就業支援等範疇努力建言，將民意帶入制度討論之中。

總括而言，今屆選委會選舉人才輩出，競爭激烈，凝聚社會各界的智慧，以「君子之爭、理念之爭、能力之爭」貫徹發揮「愛國者治港」原則下選舉制度優勢，彰顯具鮮明香港特色的優質民主，定能選出銳意進取、具執行力與遠見的新一代治港生力軍。

對接AI產業人才需求 普惠中小企業發展

招彥彥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 生物科技公司創辦人



當我們談香港的優勢，最先浮現腦海的，非「背靠祖國、聯通世界」莫屬。但筆者認為，當上海、深圳、蘇州、廣州都在生物醫藥產業上全速前進，當新加坡、韓國、日本都在爭奪同一批跨國藥企落戶，香港如果不能回答「我們的『獨特』能提供什麼」，就會被邊緣化為一個補充選項。

新一份施政報告第127段明確指出，生命健康研發院，今年內基本完成籌建。總院將聚焦「人工智能（AI）+生命科學」，而本地大學領導的三間分院，則會按各大學的科研優勢，例如先進診斷技術、新一代預防技術及治療、老年相關疾病等，制訂重點發展方向；第136段提出醫管局將籌設醫創融匯辦公室（HA-TCH，即HA Technology Convergence Hub），以需求主導為原則，通過真實場景和臨床應用的互動，加快醫療創新技術落地，並透過與持份者合作，在醫管局設施設立醫療科技示範基地，引進創新藥物與設備，同時建立需求反饋機制，將臨床實際需求適時傳遞藥械企業。這兩項合起來，正好回應了業界多年來的痛點——科研成果和臨床需求之間長期存在斷層。

筆者要特別為醫創融匯辦公室點讚。過去香港有很多優秀的AI醫療技術和創新診斷產品，都因為無法進入公營醫療體系做真實世界驗證而遇上瓶頸。私營市場再大，也無法替代公營體系那份反映全港人口的臨床數據和使用場景。有了醫創融匯辦公室這個機制，本地研發成果就有一個結構

化的路徑去和醫管局的真實需求對接，這對整個生態的意義極大。

但要提醒一句：「AI+生命科學」的紅利，不能只讓少數頭部大企業享受。真正的產業競爭力，是來自成千上百家中小企業都能用得起、用得上AI工具。AI不應只是大公司的專屬工具，更應成為整個產業都能使用的資源。香港生命健康產業的中堅力量是中小型創新企業，這些公司沒有能力自己養一支AI團隊，也沒有算力資源做大規模模型訓練。生命健康研發院和特區政府創科部門，應該考慮建立共享的AI基礎設施平台，提供算力資源池、共享數據集和共享模型，讓中小企業可以按需使用。

人才方面同樣重要。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多項吸引AI專才的措施，方向正確值得肯定和支持，但要留意：生命健康產業要的不只是純AI人才，而是懂AI，也懂生物學、臨床和監管等的複合型人才。這種人才全球稀缺，也正是香港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獨特優勢的機會。我們既能吸引內地頂尖AI人才南下，也能吸引海外華人生物醫藥人才回流。生命健康研發院應該考慮設立專門的複合型人才培育計劃，這一步走對了，未來十年香港的產業梯隊就穩了。

筆者作為一個天天在「打仗」的產業人必須直言：政策文件最終能否轉化為香港的真正產業優勢，仍要看制度改革能否落實。香港生命健康產業界願意做承擔者，不做旁觀者。醫創融匯辦公室的需求對接，我們願意做第一批走進去、把真實臨床痛點帶回研發實驗室的人。特區政府邁出的每一步，業界都會用實際行動接住。

長江香江攜手 向世界說好中國文化故事

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香港南區有一條「湖北街」，湖北武漢江漢區有一條「香港路」。本港媒體曾以「早上香港湖北街，中午武漢香港路」形容高鐵帶來的便利。交通拉近了兩地距離，文化合作亦應更進一步。近日發布的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協助內地文化作品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海外推廣。落實這一方向，需要把合作落到具體地區、具體內容，探索可持續、可借鑒的實踐路徑。

湖北是長江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兼具文博、非遺、歷史名城及影視製作資源，為多層次文化合作提供了條件；香港聯通中外，可在創意表達與海外傳播方面發揮所長。湖北需要讓文化積澱更好地走向當代、走向世界，香港則需要為文創產業拓展題材與市場。以兩地合作為切入點，既能對接雙方實際需求，也可探索香港與內地非毗鄰地區深化文化合作的路徑，為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拓展腹地、積累經驗。

優質傳統文化需要大力傳播

對湖北而言，擁有文物、非遺與歷史名城，並不意味着文化資源能自然轉化為傳播優勢。讓觀眾從欣賞文物走向理解歷史，從遊覽古城走向認識一方水土，需要在內容表達與傳播方式上持續創新。香港業界參與其中，不應止於宣傳推介，更應共同探索內容創作、品牌經營與海外傳播。對香港而言，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也不能滿足於引入展覽、舉辦活動，更要促進作品創新與人才交流。與湖北合作，可讓香港創作者深入歷史現場、接觸非遺傳承人，從地方生活汲取養分，使香港的國際聯繫優勢與內地的文化資源形成更緊密的結合。

這種雙向需求已有合作基礎。今年4月，香港與湖北簽署逾10份合作文件，涵蓋文旅等領域。應以此為契機，把項目對接進一步落實為創作團隊、文化機構與業界之間的持續協作，讓經貿往來與人文交流相互促進。文博展示、非遺傳承與影視製作，是兩地深化合作的具體切入點。三者分別着眼於歷史知識的轉化、文化技藝的傳承與故事內容的傳播，有助將文化資源轉化為可感知、可理解的作品與體驗。

湖北省博物館的曾侯乙編鐘、越王勾踐劍，既承載歷史，也為理解音樂、工藝與古人生活提供入口。兩地未來的合作，不應只是把展覽搬到香港，更要思考如何讓海外觀眾從年代與形制之外，理解文物背後的文化內涵。例如，把編鐘研究與音樂創作、影像展示及策展敘事結合起來，讓觀眾不僅「看文物」，也能從聲音與生活情境中認識歷史，增進跨文化理解。

加強文化合作 提升創新能力

湖北十堰的武當山古建筑群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武當山理陽內家武術館亦被授牌為非遺傳承基地。古建築保護與武術的活態傳承，為兩地共同創作提供了不同層次的題材。

武當故事不必止於銀幕上的武林想像。習武者如何堅持訓練，年輕人如何理解師承，文保工作者如何守護古建築，都可以成為動人故事。香港與湖北可圍繞這些真實人物與日常實踐展開創作，讓觀眾從欣賞「功夫精彩、建築壯觀」，進一步理解自律、堅守與傳承的意義。

襄陽則展示了歷史文化與影視產業相結合的可能。古隆中、襄陽古城與襄陽文化產業園，分別提供歷史題材、城市空間及製作條件。其中，襄陽文化產業園已吸引《夢華錄》《慶餘年》《長安的荔枝》等300多部影視劇取景拍攝。這表明，湖北不僅擁有文化資源，也具備將其轉化為影視作品與旅遊體驗的實踐基礎。兩地合作因而不能滿足於「到湖北取景」，而應探索從選題、劇本到製作、發行的全流程協作。從地方故事中發掘共同情感，正是文化傳播由「看見」走向「理解」的關鍵。

上述案例說明，文化合作不是資源與渠道的簡單相加，而是研究、創作、製作與傳播的相互銜接。湖北不只是香港創作的取景地，香港也不只是湖北文化的展示櫥窗，香港和湖北應成為共同研究、共同創作、共同開拓市場的夥伴。文化共生的意義，在於彼此都能在合作中提升能力，而非完成一次展覽或一項活動便告結束。從經濟角度看，文化價值與產業價值亦可相互促進。作品若能延伸為展覽、演出、出版及研學內容，便有機會形成持續投入的基礎；合作培育的專業團隊與青年人才，又能反過來支持文化研究及傳承。同時，可借助香港的平台優勢，吸引更多海外及港澳旅客赴湖北旅遊消費，將文化吸引力轉化為文旅發展動力。衡量合作成效，既要看傳播與消費帶來的效益，更要看能否留下人才、積累內容，形成持續創造的能力。

守住文化根脈 增強出海底氣

必須強調，產業化不意味着迎合獵奇，國際化也不意味着削弱特色。武當文化不能只剩神秘想像，古隆中不能只剩機謀故事，襄陽古城更不應變成千篇一律的商業街。共同創作須尊重文化本義，區分歷史事實與藝術虛構，使作品既易於理解，又經得起推敲。守住文化根脈，才能增強走向世界的底氣。

從湖北街到香港路，連接的是兩地日常；從長江到香江，映照的是共同文脈。香港與湖北合作值得推廣的，不是照搬某一套展覽或文旅模式，而是「以需求促合作、以共創增價值、以交流育人才」的思路。以此為起點，香港可與內地更多省市自治區建立長期文化合作關係，共同把地方文化特色轉化為對外交流優勢，讓生動可感的中國故事走向世界，為提升中華文化傳播力、影響力作出更大貢獻。